

《長阿含經》原語研究

辛鷄靜志 著

賀可慶 譯

【正觀編輯室】：本文之中譯承蒙原作者辛鷄靜志教授來函慨允授權翻譯及發表，特此深致謝意。其間與辛鷄教授之書信往返，而後翻譯授權之取得，幸賴萬金川教授居中聯繫幫忙，在此深表感謝之意。本文翻譯自《《長阿含經》原語研究》（平河出版社，1994年），第一章序論 pp.3-12，以及附錄 pp.53-59 兩個部分。中譯初稿由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研究生賀可慶完成，之後邀請萬金川教授審定修改之，在此一併致謝。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附錄 / 《長阿含經》音寫詞的研究與漢語音韻學的關係

第一章 序論

1. 1……漢譯佛典的原語與《長阿含經》

1.1.1……古譯與舊譯時期漢譯佛典原語的研究史

佛陀一生都活動於東印度的摩揭陀地區。因此，一般認為傳述

佛陀言行的阿含經典，最初是以東印度方言傳承的。其後隨著教團的擴張，才逐漸改換為各地的語言，進而在各地也成立了使用當地方言的新經典。今日殘留下來大小乘各式經典的梵語寫本，其間也有不少被認為原初是採用俗語（Prakrit）寫成，而隨著時代的演變才逐漸的梵語化（sanskritisation）。至於梵語化是從何時開始的，這個問題則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學者之間大致推定：梵語化的時期可能是在紀元後一~二世紀，而開始於北印度和西北印度（Damsteegt 1978:238ff.）。但是，全面性的從俗語改換為梵語則是在更遲之後的事情。

梵語化之前，在西北印度和中亞地區所使用的俗語之中，有一種語言被稱之為「犍陀羅語」，而它是以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地區為其故鄉。這種語言今日殘留下來的各類語料則包括了西起紀元前三世紀來自西北印度的阿育王碑文，東至紀元後四世紀的長安佛像碑銘。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地域之中，其間所發現的碑刻與銘文，乃至尼雅出土的文書以及《法句經》寫本等等，皆屬此類。由於這些語料在時間和空間的跨度上，是在這麼一個漫長而遼闊的地域之中所發現的，¹因此這些語料所呈現出來的語言形態也不盡相同。但是，相較於其他的中期印度語來說，這些語料卻都有其一致的共通點（譬如：梵語 śr 的複合輔音變化成 ṣ，或者是梵語的 -th- 和 -dh-，以 s 的形式出現）。基於這個緣故，這類語料所呈顯出來的語言被總稱之為「犍陀羅語」。F. Bernhard（1970）將中亞地區犍陀羅語的功

¹ 學者推定：Shahbāzgarhī 和 Mansehrā 的阿育王碑文是出自紀元前三世紀，Kharoṣṭhī 碑文則是紀元前一世紀~後三世紀，而東土耳其斯坦出土的尼雅文書是三世紀的文物（Brough 1962:§48; do.1965）。長安出土的佛像碑銘是紀元後四世紀的東西（Lin 1991:123-124）。此外，還有可能是在洛陽附近出土的 Kharoṣṭhī 書體的碑銘殘片（cf. Brough 1961）。

能，比之為中古世紀歐洲的拉丁語。在未被梵語和 *Brāhmī* 書寫體取代之前，犍陀羅語和其 *Kharoṣṭhi* 書寫體，長久以來最大的功能，或許在於做為佛教徒之間的共通語言（cf. Fussman 1989:442）。

在東漢而迄於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裡，把佛典攜往中國的僧侶們，也幾乎全都是出身於西北印度和中亞地區的。因此，在古譯與舊譯時期的漢譯佛典之中，其間據以翻譯的底本應該也有不少是出自於犍陀羅語，或是來自多少已經梵語化的犍陀羅語經典。事實上，在漢譯佛典裡，我們可以見到不少的音寫詞與譯語，其間可能的源頭語形態似乎只能用犍陀羅語來加以說明的情況。

古譯與舊譯時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某種俗語翻譯過來的。關於這項認識，其實一早便由伯希和（*Pelliot* 1914）加以指出了，因此這類說法似乎早就流傳於學界之間。但是，在這一方面的相關研究卻不太有進展。雖然學者之間意識到此項研究的重要性，可是基於這個學術領域是夾在印度學和中國學之間，從而導致能夠涉足其間的研究者極為稀少，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種困局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限於有關印度俗語和中亞語言的研究當時還不夠成熟，而另外一方面則是因於古譯與舊譯時期的佛典翻譯，其間所採用的漢語在音韻形態上是由東漢迄於魏晉南北朝時代，而這個時期正處於先秦時代的上古音和隋唐時代的中古音之間。因此在前揭這個時期的漢語音韻情況還沒有研究清楚之前，想要從同一時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詞來推定其原語，這原本就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此外，中國音韻學的研究者起初也對這時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語料並不信任，當然也多少妨礙了這一方面研究的進展。

突破這種研究困境的契機，首先是來自於印度學。1946年 *Bailey*

發表了題名為“*Gāndhāri*”的論文。在該篇論文裡，他把西北印度阿育王碑文、*Kharoṣṭhi* 書體的碑文，以及中亞出土的《法句經》和尼雅文獻的語言，名之為「犍陀羅語」。他除了指出犍陀羅語的形態之外，還推定漢譯佛典中的音寫詞，有些是來自犍陀羅語的音譯。此外，他還認為犍陀羅語和于闐語等中亞諸語言之間，有其一定的關係。

在 *Bailey* 的啓發之下，1962年 *John Brough* 校訂出版了犍陀羅語《法句經》。在該書中 *Brough* 便指出：在《長阿含經》等古譯與舊譯時期的漢譯佛典裡，其間所出現的音寫詞和譯語，有不少是只能夠以犍陀羅語的語音變化來加以說明的。另一方面，把 *Bailey* 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則是當時和前揭二人同在劍橋的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蒲氏有關中國音韻方面的研究，其間最為早出的論文是：“*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1962）。在該篇論文裡，他利用了初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語料，而著手測擬《切韻》之前漢語音韻裡的輔音系統，並根據這項測擬而以犍陀羅語的語音變化來說明初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情況。這項認識，蒲氏始終一以貫之，直至他最近的論文。

在此其間，一方面是在有關犍陀羅語等印度俗語和于闐語等中亞的語言研究，有著長足的進步；而另外一方面則是《切韻》之前的漢語音韻研究，也迭有進展。隨之而來的是，為了研究佛教史，印度學的研究者與佛教學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古譯與舊譯時期漢譯佛典的原語問題；而中國音韻學的研究者也開始信任古舊譯時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語料，而將之視為《切韻》之前漢語音韻的語料來看待。

尤其是進入到1980年代，先是印度俗語學的權威學者 *Oskar von*

Hinüber 研究了《中阿含經》裡的漢文譯語，並推定該部漢譯經典的原語是犍陀羅語(1982b;1983)，而廣受學界注目。其次，Jean Dantinne 也推定支婁迦讖所譯出的《阿柴佛國經》的原語，是犍陀羅語(1983:1-2)。接著，以漢魏音韻研究和漢藏語族研究而著稱學界的柯蔚南(South Coblin)，在他的著作“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1983)，也將東漢時期漢譯佛典中的音寫詞當做語料，而和在地儒學學者的音注擺在一起，共同再次構擬東漢時期的漢語音韻。而且，他還推定這些早期翻譯的佛典其原語都是犍陀羅語。就這樣，古譯與舊譯時期漢譯佛典的原語問題，從 Bailey、Brough、Pulleyblank 這“劍橋三人組”的手中，漸次擴展到國際學界各方學者的手中。

1.1.2……《長阿含經》原語研究的意義

如今，印度學、佛教學與中國音韻學的學者，都越來越注意到古譯與舊譯時期漢譯佛典裡的音寫語料及其原語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以今日的印度俗語學和中國音韻學的知識，對曾為 Bailey、Brough、Pulleyblank 研究語料的《長阿含經》的音寫詞，再加以研究，絕對不會是徒勞之舉。

此外，再從下列各點來看，以 A.D.412-413 譯出的《長阿含經》做為這個領域研究的出發點，是十分適當。

1：《長阿含經》是屬於法藏部的阿含經典。據推定，法藏部是使用犍陀羅語(Bernhard 1970;v. Hinüber 1989:354)。從《長阿含經》的原語研究，進而去探討同屬法藏部且為同一譯者譯出的《四分律》、法藏部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和隋譯《佛本行集經》的原語，或許能夠追蹤到法藏部所使用的語言。

2：進而發展到其他阿含經典的原語問題。《中阿含經》中顯示犍陀羅語的語音變化的譯語與音寫詞，Hinüber(1982b;1983)和捨本(1984:95)已經舉出幾個例子了。不過，目前還沒有系統性的研究。

3：在《長阿含經》譯出的同一時期，同樣的在長安的鳩摩羅什也翻譯了很多佛典。或許可以加以比較其音寫的傾向。

4：如果這些從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的音寫傾向和音韻，變得明確的話，或許就能夠著手研究竺法護等西晉時期漢譯佛典的原語。

1.1.3……《長阿含經》的譯出

在進入《長阿含經》的原語問題之前，要先談一下這部經典的翻譯經過。根據《出三藏記集》，該一經典是由出身罽賓的佛陀耶舍(Buddhayaśas)口誦原文，而再由竺佛念轉譯成漢語。²

首先，實際的翻譯者竺佛念，出身於涼州(今日的甘肅省武威市一帶)，通曉印度的語言，於前秦建元年間(365-385)在長安從事譯經工作，譯出《中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等等許多經典。413年完成翻譯的《長阿含經》，則是他最後的譯作(畝部 1970)。

其次是佛陀耶舍。根據《出三藏記集》，他出身於罽賓的婆羅門，十三歲在佛門出家，二十七歲受具足戒。後來去了沙勒國，以太子師傅的身份，受到厚重的禮遇。稍後來到沙勒國的鳩摩羅什，終生對佛陀耶舍極其恭敬，而事之以師禮。此後，佛陀耶舍到了姑臧(今日的甘肅省武威市)，進而為後秦姚興所迎請，於408年進入

² 在收錄於《出三藏記集》第九卷僧肇的「長阿含經序」(大正 55, 63b-c)中，有文曰：「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為譯」。第十四卷的佛陀耶舍傳(102a-c)，也是一樣。

長安。一直到 413 年，在翻譯出《四分律》四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等等經典之後，他又回到罽賓。此外，由於致力於保存法藏部律典的《四分律》，他也被認為是屬於法藏部的沙門。³

他似乎具有極其優秀的記憶能力，能夠背誦不少的佛典。根據《出三藏記集》的傳記，他十九歲「誦大小乘二百余萬言」，二十七歲受了具足戒之後，也還是「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還有，日後在長安誦出《四分律》之時，姚興曾經對他的記憶能力有所懷疑。故而，先令他口誦五萬言左右與西方戶籍和藥方有關的文章，而於三天之後，令他再背誦一次，並與前次背誦的筆記加以比對，其間竟然一字一句無不吻合，姚興這才佩服他的記憶能力。

或許，《四分律》與《長阿含經》是由佛陀耶舍背誦而出，再根據此一口傳文本加以翻譯而成。

1.2 有關《長阿含經》原語向來的研究

1.2.1……Weller

最初指出《長阿含經》的原語不是梵語而是俗語的，是 F. Weller。他分析《長阿含經》第十五經《阿鯁夷經》中的 36 個音寫詞，而得到了這個結論。不過，無法肯定是什麼樣的俗語（1928-30:104-112）。在他所舉出的例子之中，也包含著原有的 17 個音寫例以及若干錯誤的比定。雖然如此，這仍然應該評之為是印度學學者最為初步的嚐試，而企圖明確地指出漢譯佛典的原語和俗

³ 《四分律》序（大正 22,567a-6）上記載：為求佛典於 392 年遠赴西域的支法領，在于闐遇見通曉大乘三藏（經、律、論）的法藏部沙門佛陀耶舍，在該地得到很多的經典。參照西村 1992。

語之間的關係。

1.2.2……Waldschmidt、季羨林

接著，Waldschmidt 在校訂吐魯番出土的梵語寫本 Mahāsamāja-sūtra 之際，曾經先行詳細比對此經的梵本、巴利本和宋譯《長阿含經》第十九經《大會經》，終而才出版其校訂本（1932）。在《大會經》中可見的二百多個音寫例裡，他又再加上由高本漢（Karlgren 1923）所測擬的漢語中古音音值，並在卷末附錄各個漢字語音和梵語音等等的對照表。並且，在分析漢字音寫詞之餘，他更進一步地嘗試測擬其原語的形態。Waldschmidt 同時並指出在《長阿含經》的原語和中亞出土《法句經》（GDhp）的語言之間有其類似性（1932:226f.;cf.do. 1980:162f.）。

因為《大會經》是源源本本的將原文直接音寫過來，所以連名詞、形容詞也以格變化的形式而加以音寫。Waldschmidt 也已經注意到：梵語名詞、形容詞語尾的-am，在《長阿含經》的原語中，變化成-u（或者是-o）（1932:230-31）。他的學生季羨林進而以這個現象，來證明《長阿含經》的原語是西北印度方言（犍陀羅語）（1944:142f.）。

1.2.3……Bailey、Brough

Bailey 將中亞出土的《法句經》（GDhp）等等的語言，名之為犍陀羅語。他啟發了犍陀羅語、于闐語和《長阿含經》原語之間的關係（1946）。

此外，出版校訂 GDhp 的 Brough，雖然在其序論中承認：犍陀羅語和《長阿含經》的原語之間，是有幾個相異點。不過，他還是

推定：基本上它們是同一種語言（1962:50-54）。他所舉出的根據如下：

1. 保留子音+r的音，比如：br、tr等等。
2. 有-v->-m-的語音變化。
3. 有-t、-th->-d、-dh-的語音變化。
4. 從對應於巴利語文本 bhaddam te 的漢語音寫「跋陀若」來看，可以推定漢譯所據的原語為 bhaddaṇa（或者是 bhadraṇa），而這則近似於犍陀羅語《法句經》的 bhadraṇu。
5. 齒擦音 ś、ṣ、s 之間的區別非常明顯。
6. 有著-śr->、-ṣ-的語音變化。

根據 Brough 這個結論，《長阿含經》的原語是犍陀羅語，大體就成定論（拾本 1988:104）。

可是，Brough 所舉的證據是有問題的。首先，1和5可以解釋為：原本就是在梵語化的過程中出現的現象，而這並不一定就是犍陀羅語。他舉出 80b5「菴婆羅迷」，做為2的例証，認為這是*abrami (<abravit) 的音寫。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確實是相當吻合。可是，在沒有巴利文本和梵本的支持之下，就不太適宜把它拿來做為例子。的確，在其他地方也有-v->-m-的例子（2.6.2.i.）。不過，這種變化也可見之於其他的俗語（Pischel 1900:§261）。3也可以是俗語的證據，但是不能說一定就是犍陀羅語。還有，做為-th->-dh-的例子，他所舉的 80a-9「阿陀」（* adha<atha），是有問題的（cf.2.6.1.i.）。在我們的資料之中，並沒有-th->-dh-的例子（cf.2.4.4）。-ṃy->-ññ-的變化，在巴利語等俗語之中也可以見到。此外，我們也無法否定4的語形

也有可能出現在犍陀羅語之外的其他語言裡。因此，在 Brough 所舉出的證據之中，能夠顯示出犍陀羅語特有變化的，只有6而已。

另外，Brough 以後又一個一個的舉出《長阿含經》中可見的例子，比如：upa->va-（cf.2.3.9.i.）和-nd->-nn-（cf.2.9.7.i.），用以證明《長阿含經》的原語是犍陀羅語。這些例子則的確是犍陀羅語特有的變化。

1.3……問題之所在

1.3.1……向來研究的問題點

正如前節所見，至今的研究主要是根據《大會經》的音寫詞，而不是整部的《長阿含經》。還有，Waldschmidt（1932）的研究，基本上乃是梵語寫本校訂本的附錄。對於《長阿含經》的原語問題，他只不過是簡單的提一下其個人的看法而已。至於 Bailey 和 Brough，他們二人也不過是隨意從《大會經》的音寫語料裡，選出一些被認為具有犍陀羅語特徵的例子罷了。但是，正如 Brough 自己所承認的（1962:54），《大會經》裡的音寫詞，還有不少是無法用犍陀羅語來說明其音韻現象的。

除了原語是不是犍陀羅語的這個問題之外，要釐清《長阿含經》的原語，或許必須全面研究整部《長阿含經》的音寫詞，而不是僅僅局限於《大會經》的音寫語料而已。

此外，不只是音寫詞而已，還必須探討在譯語上，有什麼樣的反映。在研究漢譯佛典之際，如果不考察音寫詞和譯語這兩方面的話，恐怕就不夠完備。音寫上可見的語音變化是否真的來自原語，這個疑問可以用譯語來加以檢測。相反的，如果像 v. Hinüber

(1982b;1983)那樣，單從譯語方面去推定原語的問題，則誠屬危險之舉。⁴

再者，在向來的研究中，高本漢(1923)根據《切韻》(A.D.601成書)而構擬出來的漢語中古音音值，則為多數學者援引而用之以分析佛典的音寫語料。此後，有關犍陀羅語和中亞語言的學問有所發展。而同樣的，中國音韻學也極其興盛，並對高本漢所構擬的音值提出了種種的訂正。並且，有關從東漢而至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音韻知識，也大大地有所增長。從這一點來看，向來有關佛經音寫詞的研究，都有必要重新加以修正，而使其成為最新的版本。

1.3.2……已經梵語化了嗎？

Brough 認為《長阿含經》的原語還未開始梵語化(1962:56)。可是，在西北印度的 Kharoṣṭhi 碑文中，已然可以見到在迦膩色迦王(其即位年代從 A.D.78-230 之間，有種種不同的說法)的末年，部分梵語化的資料(Konow 1929:ixxix;Damsteegt 1978:221)。而且，和《長阿含經》(A.D.413 譯出)大體上同一時代譯成漢語的《中阿含經》(397-398 年譯出)的原語，則被認為是帶有幾分梵語化的犍陀羅語(v.Hinüber 1982b:250-51)。從這一點來看，儘管只是部分性的，漢譯《長阿含經》所據以翻譯的底本非常可能已經開始梵語化了(cf.Waldschmidt 1980:168-69)。此外，其他地方還可以見到本來是以犍陀羅語寫成的經典漸漸梵語化的實例(Schmithausen

⁴ v.Hinüber 之所以會將《中阿含經》的 Pa.pannadhaja 譯成「智慧鏡」，是由於在尼雅文獻中，j 和 ś 都變成【z】，以致於把*dhaja 和 daśa (<Skt.darśa) 混淆在一起。在《中阿含經》中，梵語的-ś-被音寫成中古音的 ś，並沒有-s-變化成【z】的痕跡。這就如實顯示出，只隨意選幾個譯語來做研究，是多麼危險！

1970:80;v.Hinüber 1989:353-354)。

因此，本研究也準備把梵語化的可能性列入考量之中，根據那些由漢字音寫推定而來的原語形態，而嘗試辨明以下四種情況：(1)和俗語共通的形態、(2)和犍陀羅語特有的形態相一致的地方、(3)呈現梵語化的所在，以及(4)不見於其他諸例的變化，並藉之以朗現《長阿含經》原語的多樣性。

1.3.3……和中國音韻學的關係

誠如蒲立本在其有關漢語中古音輔音體系的研究(1962)之中，再三引用《長阿含經》的音寫語料所顯示的，事實上除了本研究的對象《長阿含經》之外，魏晉南北朝譯出的諸多漢譯佛典，對研究漢語音韻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語料。只要能夠細心的運用其間數量極其龐大的音寫語料，則對《切韻》之前漢語音韻的研究來說，應該可以是一筆豐富而可靠的資料。可是，由於資料的特性，在研究上必須兼備古代漢語、梵語、巴利語、俗語、中亞語、藏語等等的知識，以致於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展開系統性的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長阿含經》原語的形態，而不在於研究漢字語音。所以，並不直接涉及漢語音韻學上的問題。不過，在研究的過程中所察覺到的四個有關漢語音韻的問題，我們將放在附錄(Appendix)裡來加以討論。

1.4……資料

1.4.1……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

自從 Waldschmidt 的《大會經》研究以來，《長阿含經》的原語

研究大體上只限於這裡所處理的音寫詞。在《大會經》之中，明確的和梵本、巴利文本等對應的音寫詞，大約有 220 個。這些是極為重要的資料。不過，本研究還徹底的查遍了《大會經》以外的 29 經，找出能和梵語、巴利語等對應，且非借用於《長阿含經》之前的既成音寫。這樣的音寫詞有 280 個，⁵也一併列入資料之中。這些合計大約共有 500 個的音寫詞，是這次研究的主要資料。

此外，因為原語特殊的語音變化，應該必然會反映在音寫詞上，所以特別注意和巴利文本及梵本等有出入的音寫詞。藉著分析音寫詞，從其他的角度，來確認所推定的語音變化。可是，這個工作並不容易，況且資料也並不充足。這次只能處理 15 個音寫詞而已。這方面的研究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行發表。

底本採用《大正新脩大藏經》（以高麗藏為底本）第一卷所收錄的本子，並以高麗藏影本（東國大學刊）來訂正錯誤。同時，也參考了宋版磧砂藏、金藏廣勝寺本、房山石經等等。

巴利本採用 Pali Text Society 所刊行的 *Dīgha-nikāya*，梵本採用由 Waldschmidt 等人所整理校刊中亞出土的梵語寫本，並適宜的參考藏譯本等等。此外，有關《長阿含經》各經典的文獻介紹，連載於《阿含月刊》第 47-100 期（1984-1989）現代語譯（=「現代語譯 阿含經典—長阿含經—」全 6 卷，丘山、神塚、辛鷄、菅野、末木、引田、松村譯，平河出版社 1994~）的內容簡介，已十分詳細，本研究就加以省略。

1.4.2……資料的標記方法

⁵ 這裡被視為資料的，都是筆者暫時判定非屬既成的音寫詞，但並非完全沒有是既成語的可能。

次章以下所舉的音寫詞，都分別標上《大正藏》的頁、段、行。行數從前面 15 行以內，以正數標記；從後面 14 行以內，以負數標記。

另外，在音寫詞中，附上由高本漢（1957）構擬而由李方桂（1971:4-7;1974-5:224-7）所修訂的中古音音值。不過，仿效柯蔚南的標記法（1983:41），修正了下列 4 點：

1. · - 標成 ? - 。
2. â 和 ĩ 標成 Ń 。
3. ě 標成 e 。
4. 介音的 -u- 標成 -w- 。

對應的印度語，基本上以梵語標記之。必要的話，也加上巴利語、佛教梵語等等。此外，以大寫為首的字是專有名詞。

附錄 / 《長阿含經》音寫詞的研究與漢語音韻學的關係

對研究漢語音韻而言，除了本研究所處理的《長阿含經》（A.D.413 年於長安譯出）之外，從東漢而至南北朝時代所問世的漢譯佛典，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而其間出現的大量音寫語料，

對於漢語字音，尤其是在有關聲類的研究上，更是最為寶貴的資料。有關這個時期的韻類研究有：羅常培與周祖謨《漢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 1958）、Ting Pang-hsin（丁邦新）《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Taipei 1957）、劫井健一《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東京 1975）、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中國語言學報」1，1983）等等，因而有關韻類方面的內容目前實已日趨明確。不過，在有關聲母音值的研究上，只散見於最近由蒲立本與柯蔚南等人所發表的論文裡，目前並沒有完整的著作問世。

從本土性的近代漢語音韻學建立之初，歐洲學界就已經利用了漢譯佛典中的音寫詞，來構擬漢語的中古音等等。最近，蒲立本與柯蔚南就經常採用這個方法來著手他們的研究。中國方面採用這個方法的，有羅常培和周法高等人，而日本方面則有滿田新造（《支那音韻斷》1914）和水谷真成等人。可是，高本漢（1963-7:18-19）、河野（1966）和丁邦新（1975:32-3）等人，不但懷疑佛典的音寫漢字作為研究漢語音韻資料的可靠性，並且還非常的排斥這種操作方式。蒲立本就因為完全根據了佛典音寫詞來構擬漢代輔音體系，而遭到他們強烈的批判。另一方面，柯蔚南則在承認完全根據佛典音寫詞的危險性之下，採取了介於蒲立本和其批判者之間的中庸立場，雖然在他的東漢音韻研究中，也利用到了安世高、支婁迦讖與康孟詳等人譯經中所著錄的音寫材料（1983:7-8）。

由於漢代佛經音寫詞的數量極少，而其原語的問題又相當複雜，因此利用這些僅有的音寫材料而嘗試系統性的構擬漢代的漢語音韻，的確是很危險。不過，西晉以後的譯經數量則相當龐大，若是能夠審慎地利用經中無數的音寫語料，則對《切韻》之前的漢語音韻研究而言，應該可以是豐富而可靠的資料。可是，由於資料的

特性，古代漢語、梵語、巴利語、俗語、中亞語、藏語等等便成為了研究上必備的知識，以致於直到目前為止，都還不太有人投身其間。這是學界目前的實際情況。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於探討《長阿含經》原語的形態，而並不在於研究漢語字音。因此，我們此處並不準備直接涉及漢語音韻學上的問題，而只打算提出以下四個問題稍事討論一番罷了。

1. ……羊母的音值

高本漢把中古音羊母（Karlgren 0【零】；李方桂 ji-）的上古音音值標為*d-（1954:273），李方桂則推定其為 dental flap，故而標作*r-（1971:10）。關於漢代的音值，研究《釋名》的包擬古（Bodman 1954:31-33）和徹底查遍鄭玄等人音注的柯蔚南（Coblin 1983:60-62），則從羊母都是和 s-、z-、dz-等等 contact 來看，推定漢代羊母的音值為 ž-、z-；此外，由於在魏晉郭璞等人的音注之中，羊母一邊和 dz contact，另一邊又和 ś contact，故因柯蔚南便推定其音值為 ž-（1974-5:310-11）。

另一方面，因為梵語的 ś、y 在於闐語中變成【ž】（Emmerick 1981a:199-200），在初期漢譯佛典中，以羊母出字音寫而成「阿育（jiuk）」（Skt. Aśoka）、「閻（jirām）」（Skt. Yama）等等。所以，蒲立本也據此推定羊母在漢代而至唐代的音值為 ž-（1962:115）。同樣的，徹查漢代佛典音寫詞的柯蔚南察覺到羊母一方面與梵語的 s、c、j、ś 對應，另一方面又與 y 對應。從前者的對應，推定羊母是 fricative 或是 affricate。而關於後者，由於梵語的 y 在俗語變成 j，故而認為這些音寫原語的 y 也變成 j，因之推定這些音寫羊母的音值為 ž-

(1983:62-63)。但是，蒲立本和柯蔚南對印度俗語的認識，是有問題的。他們認為漢代佛典的原語是犍陀羅語，或是與其類似的語言（Pulleyblank 1983:84f.; Coblin:34-38）。可是，在犍陀羅語之中，語頭、母音間的 *y* 並沒有變成 *j*。于闐語中 *y* 變成【*ž*】的例子，或許也是從其他地方的俗語借用而來的（Norman 的啓發）。

平山在其有關中古音的講義中推定：「羊母的上古音值是和中古音一樣的前部硬口蓋的弱摩擦音/*j-/」（1987:55-6）。

基於下述的理由，至少《長阿含經》的音寫（恐怕也包括漢代的音寫），正如同平山對上古音的推定，羊母的音值是屬於前部硬口蓋的弱摩擦音，並是原語 *y* 的音寫。

在我們的資料中，羊母對應梵語-*k*-的例子有五個（2.3.1.ii.）。若不考慮印度、中亞的語言，-*k*->-*j*-的變化應被視為顯示-*k*->-*y*-的變化。同樣的，羊母對應-*c*-的例子有七個（2.3.3.）。在俗語之中，-*c*->-*j*-是屬少見的例外（Brough 1962:226；Norman 1970:134-35）。不可將其視為顯示這種變化，反而應視其為顯示-*c*->-*y*-的變化。此外，*iy*-、*dy*-在原語只能視為變成 *j*-。如果，真的正如同蒲立本所說的，羊母的音值為 *ž*-的話，這些應該也拿羊母字來音寫，但實際上它們卻是用禪母字來音寫（2.9.4.）。如此，原語的 *j*【*ž*】以禪母字來音寫，*y* 以羊母字來音寫。在《長阿含經》中，這樣的區別是明確可見的。因此，我們可以推定羊母的音值並不是 *ž*-，而是類似原語 *y* 的音。

在《長阿含經》（A.D.413）中，原語的 *s*、*ś*、*j*、*y*，依序以心母（*s*）、書母（*ś*）、禪母（*ž*）、羊母（*j*），清楚的分別音寫。可是，在二世紀中到四世紀的佛典音寫，羊母卻被用來做為這四個音的音寫。該如何來說明這個現象呢？這是留待日後的課題（cf. Pulleyblank 1983:85）。

2. ……第一口蓋音化

關於拿中古音的章組字（正齒音三音）和見組字（牙喉音），來通用諧聲符，自來有種種不同的說法（陸志韋 1947:289-99；董同和 1949:58；Pulleyblank 1962:98-107；李方桂 1974-5:242；Coblin 1983:57-59）。河野（1950）的說法，被稱為「第一口蓋化」。也就是說，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中間時期，有幾個重紐四等牙喉音，在口語上變成口蓋音化（譬如：「臣」、「支」、「氏」）。不過，在文語上，還依然保有 *velar* 的音。

在我們的資料之中，也有幾個例子是和這個問題有關的。

(i) 首先，115 c-12「樹臣（*žjen*）陀羅」對應 Skt. *Yugandhara*，「臣」是-*gan*-的音寫。這就顯示出「臣」還未口蓋音化。

(ii)「翅」（*šje*-）在佛典中是 *k*、*kh* 的音譯（cf. 赤沼 1931:索引），在《長阿含經》的資料之中，也做為 *kkhi*、*kke*、*ke* 的音寫，例如：80b-14、-13「富羅翅大」（*purakkhitā* < Skt. *Puraskṛtvā*, Pa.*purakkhatvā*）、79b2「釋翅搜」（*Śakkeṣu* < Skt. *Śakyeṣu*, Pa.*Sakkesu*）、25a-9「翅舍金披羅」、107b-9「翅舍欽婆羅」（每一個都與 BHS. *Keśakambala* 對應）。這個「翅」包含問題聲符「支」，或許在漢譯佛典所使用的翻譯方言中，這個字也帶有 *velar* 的音。

(iii) 相反的，「祇」（*gjie*）在佛典中也做為 *g*-的音寫（e.g.「祇夜」Skt. *geya*、「羅閱祇」Skt. *Rājagṛha*），不過大多都做為 *ji*、*je* 的音寫（e.g.「祇洹」Skt. *Jetavana*、「祇陀」Skt. *Jeta*）。在《長阿含經》之中，也是和 *ji* 對應，例如：80a-1「祇陀」（Skt. *jitā*）、21b11「婆祇」（Pa.*Vajji*, Skt. *Vṛjji*）。這個「祇」也包含問題聲符「氏」，可能在漢譯佛典所使用的翻譯方言中，「祇」有口蓋化的情況。

(iv) 在柯蔚南所收集的東漢漢譯佛典的音寫語料之中，「耆」(gji)與原語的 g 對應的例子，有一個(「耆闍崛」Skt. *Gr̥dhrakūṭa*, Pa. *Gijjhakūṭa*)；與原語的 j 對應的例子，有二個(「阿波羅耆陀」Skt. *aparājita*, 「拔耆」Skt. *Vṛji*, Pa. *Vajji*)。柯蔚南認為在「耆」(gji)與原語的 j 對應的情況之下，「耆」是「嗜」的誤寫。不過，這個說法有疑問。在我們的資料之中，也有「耆」(gji)與原語的 j 對應的例子，譬如：107b-9「阿耆多」(BHS=Pa. *Ajita*)。在東漢而至南北朝的方言或是口語之中，「耆」可能是有口蓋化的情況。

(v) 其他，還有「斤」(kjōn, kjōn-)對應原語 *tin* 的例子，譬如：115b-2「斤提」(Skt. *tinduka*)。

3.……韻尾-s 的問題

在上古音之中，去聲和入聲之所以是同一類，可以互通相押，是因為當時的去聲也有閉鎖韻尾。從上古到中古之中間時期，閉鎖韻尾逐漸消失，最後終於獨立成中古音的去聲一類。

水谷就指出在東漢到六朝的音寫例中，屬於泰部的「賴」(*lâi-*)、「帶」(*tâi-*)，就有具這樣的閉鎖韻尾的情況(1967:98-100)。

另一方面，蒲立本主張從漢代到三、四世紀(甚且，至少南方到六世紀)，中古音中變成去聲的漢字是具有-s的韻尾。他舉出屬於泰部、祭部、微部的漢字例(1962:216ff.;1973)。比如：「波羅奈(*nâi-*)」(Skt. *Vārāṇasī*)、「罽(*kjâi-*)賓」(**Kaśpīra*<Skt. *Kaśmīra*)。

可是，對於蒲立本的說法，丁邦新抱持著相當懷疑的態度(Ting 1975:43-44. Cf. Pulleyblank 1977:128-29)。其理由是：(1) 做為漢、魏音寫的引用例，也有可能是屬於更早以前的年代；(2) 蒲立本所

舉的引用例之中，有的是有問題的。此外，丁氏還認為這些有問題的微、泰、夬、祭、廢部等等，從上古而至魏晉、南北朝，都具有-d的韻尾，到了中古才變成-i(但是，吳地方言在魏晉變成-d>-i)(240-241,264)。

甚且，這些韻類的漢字以音注來說，在中古都和具有韻尾-t的字 *contact*，又和梵語的 *s*、*ṣ*、*ś*、*dh*、*th*、*t* *contact*。因而，通曉東漢音注與音寫的柯蔚南就據此推想其具 *dental spirant* 的韻尾-t-【*θ*】(1983:83-87.Cf. Pulleyblank 1983:100,fn. 12)。

在我們的資料之中，也有微、泰、祭部的漢字和梵語的齒擦音 *ṣ*、*ś*、*s* *contact* 的例子。例如：19a4「福貴(*kjwei-*)」(Skt. *Pukkuśa*, Pa. *Pukkusa*)、30a15「沸(*pjwei-*)」(Skt. *Puṣya*, Pa. *Phussa*)、82a7,95a-7「沸(*pjwei-*)伽羅娑羅」(Skt. *Pauṣkarasādi*, Pa. *Pokkharasādi*)、45b13「劫貝(*pwâi-*)」(Skt. *karpāsa*, Pa. *kappāsa* Cf. Pulleyblank 1981:286)、80a11「世致(*śjâi-ṭi*)」(Skt. *-śreṣṭha*, Pa. *-seṭṭha*)。的確，這些例子都顯示出閉鎖韻尾的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是同樣屬於微、泰部的去聲漢字，卻有不能推想其具閉鎖韻尾的例子。比如：80b13「娑未(*mjwei-*)弟」(Skt=Pa. *samiti*)、80a-11「帶(*tâi-*)叉」(Skt. *Takṣaka*)、80b-12「富羅大(*dâi-*)攬」(Skt. *Purandaraha*)等等。

4.……魚部的音值

關於上古音的魚部在中古音屬於模(-wo)、魚(-jwo)、虞(-ju)韻類的漢字，對它們在東漢時期主元音的音值，柯蔚南(1983:100-103)將佛典以外的文獻大體上推定為 *a*；但有關東漢時期漢譯佛典的音寫材料，由於它們與印度語的 *o* 對應，故而推定為 *o*

(但是, 在他的音寫資料之中, 沒有魚韻的字, 對此判斷加以保留)。
根據我們的資料, 正如下列所舉的例子所示, 這類的漢字是與梵語、
巴利語的 u、ū、o 對應。所以, 推定這些漢字的主母音還是 o。

【i】……模、姥、暮韻的漢字

- 80b-2 「嗚 (MC. [?]wo) 摩」(Pa. ummā-, BHS. umā-)
2b2 「烏 (MC. [?]wo) 暫婆羅」(Skt = Pa. udumbara)
47a-6 「烏 (MC. [?]wo) 暫婆利」(Skt = Pa. Udumbarikā)
80b-2 「攄 (MC. lwo) 耶」(Pa. Rojā)
80b13 「裊弩 (MC. nwo:)」(Pa. Venhu-, Skt. Viṣṇu-)
33a-8 「布 (MC. pwo-) 和」(Skt. Potana)
109c-8 「布 (MC. pwo-) 吒婆樓」(Pa. Poṭṭhapādo)
80b9 「蘇 (MC. swo) 彌」(Pa. Soma)
80b15 「鑽大蘇 (MC. swo) 婆尼拵」(Pa. Candassūpanisā,
Skt. Candrasūpaniṣad)
80b-14 「蘇 (MC. swo) 黎耶蘇 (MC. swo) 婆尼拵」
(Pa. Suriyassūpanisā, Skt. Sūryasyopaniṣad)
80b-13 「蘇 (MC. swo) 提耶」(Pa. Suriya-, Skt. Sūrya-)
80a-3 「素 (MC. swo-) 槃鯧」(Skt. supaṃa-, Pa. supaṃṇa-)
80b12 「暮 (MC. mwo-) 陀婆那」(Skt = Pa. modamānā)
33a-6 「路 (MC. lwo-) 樓」(Skt = Pa. Roruka)
112c-10 「露 (MC. lwo-) 遮」(Skt. Lauhitya)

【ii】……魚、語韻的漢字

- 34b-10 「居 (MC. kjwo) 薩羅」(Skt = Pa. Kosala)
34b-9 「居 (MC. kjwo) 樓」(Skt = Pa. Kuru)
23b10 「初 (MC. tshjwo) 摩」(Skt. ksauma, Pa. khoma)
80b-8 「摩鯧拭 (MC. sjwo, sjwo-) 多摩」(Pa. Manuṣuttama-, Skt.
Mānuṣottama-)

【iii】……虞韻的漢字

- 63c3 「瞿 (MC. gju) 夷」(Skt = Pa. Gopikā)

105b-3 「瞿 (MC. gju) 曇摩」(Skt = Pa. Gotama)

107b15 「瞿 (MC. gju) 舍利」(BHS. Goṣāli)

126a-14 「瞿 (MC. gju, kju) 波梨」(BHS. Kokālika)

其他, 還有與梵語、巴利語的 a、ā 對應的例子。譬如: 80b11
「伽予 (MC. jiwo, jiwo:)」(Skt. kāyāḥ, Pa. Kāyā)、26a-12「闍怒 (MC.
nwo-, nwo:)」(Pa. Channa)。可是, 原語的語尾也有可能不是 ā, 而
是 -o、-u (e.g. kāyo, Channo)。從這些例子, 很難斷定「予」、「怒」
具有主母音 a (注)。

(注):《長阿含經》的原語, 其語格 (case) 可能和今日殘留的巴利本、梵本不一樣。並
且, 假如原語是像犍陀羅語那樣的語言, 也就有可能語末母音幾乎完全不加以區別 (cf.
Fussman 1989:471f., esp.473,480)。因此, 很難從音對應上, 去判斷對應巴利語、梵語語
末漢字主元音的音值。以下, 舉出幾個例子:

【i】……模韻、暮韻的漢字

- 80b-13 「婆蘇 (MC. swo)」(Pa. Vāsavo)
80b-12 「富羅大攄 (MC. lwo)」(Pa. Purindado, Skt. Purandarāḥ)
80b13 「提步 (MC. bwo-)」(Pa. deva, Skt. devah)
80b-1 「遮婆陀暮 (MC. mwo-)」(Pa. Sahādhammā)

【ii】……魚韻的漢字

- 80a-5 「那伽羅除 (MC. djwo)」(Pa. nāgarājānam, Skt. nāgarājñām)
80b5 「細如 (MC. n̄zjwo)」(Pa. senāṃ-, Skt. -senāṃ)
80b-9 「余 (MC. jiwo)」(Pa. yo, Skt. yā)